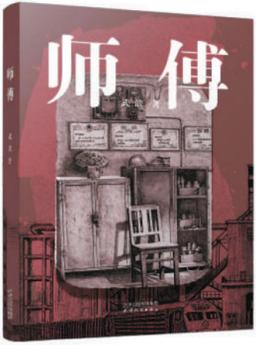


◎创作谈

# 致敬车间的那些师傅们

武 敬



创作长篇散文《师傅》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我有过6年工厂经历，6年时光给我人生之路带来无法抹去的印记；其次，1983年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是工业题材，给我的写作带来永不褪色的工业印记。这两方面的“印记”，是我创作“社会工业题材”的“永动机”。同时，也有遗憾和感触。比如，我虽然在车间工作过，但是没当过师傅，没有享受过你在前面走，徒弟跟在你身后的成就感；没有经历过看到徒弟在你通俗易懂的讲解下掌握劳动技能后而豁然开朗的自豪感。随着年龄增大，在遗憾和感触中，我总是想起40多年前对我指导、帮助、包容的师傅们，只要想起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温暖。

我先后有过两位令我骄傲的师傅，他们是“带我”的师傅，属于车间“官方认定”的师徒关系。第一个师傅姓杨，第二个师傅姓王。他们也是铆工组长，一个年轻、一个年长；杨师傅和王师傅在车间里都是顶呱呱的技术高手。我目睹过工程师和技术员，在摊开的图纸面前，谦虚地向我师傅请教的过程。只要想起那些场面，我就激动不已。

删天的长篇小说《海州吉果》(作家出版社)写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却没有选取历史大事件中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而是选取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吉果。吉果出身底层，来自海州农民家庭，但却和谭嗣同等出身官宦人家的维新派志同道合，他同样是历史的参与者，起着重要作用。

清末的海州在今天的连云港，吉果也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那方朔式的诙谐幽默在连云港深入人心，是民间传说故事的重要人物。他的经历颇为传奇，在删天笔下，他的命运一再反转，从被通缉的朝廷钦犯到与海州知府妹妹一见倾心，从军机大臣的座上宾到海州州同、学正身份的转变。吉果不随波逐流，也不贪生怕死，他伸张正义，有勇有谋，爱国爱民，与贪官污吏斗智斗勇，一次次地在历史转折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有着海州人特有的忠义果敢、乐天幽默的个性。他代表着

我早就有过想法，用文字去书写带过我的师傅以及所有指导过我的师傅们，还有车间里的其他师傅，用文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同时也弥补我虽然当过工人，但没有当过师傅的人生遗憾。我始终认为，60岁以后的人生是用来弥补遗憾的，而用文学的方式弥补又最神圣。

写作伊始，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采用哪种体裁来讲述师傅的故事？第二个，如何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第一个问题很快确定下来，采用“非虚构”散文体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我犹豫不决。最初，我准备采用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方式来创作《师傅》。很多年前我有过文本试验，钟情“读书笔记”，读完一部经典作品，用散文语言和小说结构来写读书笔记，后来再改成“读书笔记小说”和“读书笔记散文”。再后来，我又把“读书笔记”的写作更加极致化，把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和不同国籍的经典作家进行新的整合和构建，变成一部完全陌生的文学作品，比如《李和卡波特来耶德瓦布内》等。我想用类似的方式来写作《师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担忧“三工”(工业、工厂和工人)题材和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故事，读者是否有耐力和精力来静心阅读。我甚至还想过，要巧用悬念来结构情节，创作“非虚构”的《师傅》，就像被称为“悬念女王”的美国作家桑德拉·布朗所认定的那样——“每部小说都应该有悬念”。

最后，我还是决定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式”手法来写《师傅》，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工作场景和劳动技能的描摹以及劳动者的内心情感，从而抛弃惯常的写作思路——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发展，按照生活原貌去创作《师傅》。

在写作《师傅》之前，我正在阅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农事

诗》，他笔下的劳动场面没有悬念，却依然能打动人心。“在固定的窝棚之下，往往会有蟒蛇潜入，触之必伤人……还有一种蝮蛇……通常蛰伏于阴暗的屋内，紧贴地面，在牲畜间喷洒毒液。抓起石头，紧握木棒，牧人们，当其气势汹汹地抬头，鼓动嘶嘶作响的脖颈，务必手起棒落，迎头痛击！”

古罗马牧人充满动感的劳动画面，让我想到刚进厂时看到的工人师傅抡大锤的场景。工作性质决定，抡大锤是铆工必备的劳动技能。钢板在运输过程中，表面会有凹凸不平的问题，在工件焊接、组装之前，工人要对钢板进行找平。虽然当时有了油压机、滚板机等机械设备，但是面积不大的凹凸面，机器无法完成找平工作，必须手工操作，需要铆工用大锤锤击。大锤重量有多种，铆工最常用的是18磅大锤。抡大锤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技巧。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抡大锤的画面带着力量的美感。我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多年以后在生活中遇到悲怆、胆怯、畏缩、犹疑之时，我所经历过的高强度劳动，的确能抚慰内心深处突然闪过的脆弱，带来精神上的鼓舞。这是没有经历过高强度劳动的人不能体会的。

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假如《师傅》只是单纯书写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即使用笔再细腻再精致，那也是片面的。

古老的《诗经》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启示。只是描写“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肯定不是劳动的完整表述，一定要有“河水清且涟漪”的自然风光描写，要有劳动场景和自然风光的相互结合，以及劳动过程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呈现。我想，围绕“师傅”本身，还要将“涟漪”不断向外拓展。于是，我在《师傅》中除了讲述“师傅”的故事，还有车间氛围、生产场景的描述；还有师傅家庭状

况、亲人命运的表现，以及《师傅》发生地天津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能停步，还要将“涟漪”继续延伸，不仅书写“师傅”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还要通过讲述他们子女的命运，将叙事时间合理而自然地延续到当下，以与当下的年轻读者产生精神共鸣。

我还把少年时代对于《水浒传》的喜悦，投射到《师傅》的写作中。少时读《水浒传》，我能把一百零八将与他们对应的绰号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哥哥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来到家里，上小学的我就会被叫出来进行才艺展示。来人拿着《水浒传》，或说人名让我背出绰号，或说绰号让我背出人名。在《师傅》中，我也把12位师傅的名字配上12个绰号，在吻合当年天津工厂的流行风尚之外，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阅读乐趣的情感追忆。另外，我在《师傅》的写作中，努力追求口语化的叙述，努力与工人师傅的职业个性以及天津地域文化相互匹配，正像为本书作序的蒋子龙先生讲的那样，“很像是满嘴天津话的人在漫话家常，自然清新，时有妙语”。我知道这是蒋老师对《师傅》的鼓励，但我确也是在向这方面努力。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调离车间时，师傅对我鼓励的话语：你去了文化单位，可以更好发挥特长，你要多写写咱们车间，多写写车间的铆工。我答应了，但是答应得不是那么坚定，因为我当时尽管已经发表作品，但还非常幼稚并缺乏自信。那时候，我在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师傅们并不都能看到；发表在天津本地报纸上的作品，师傅们是能看到的。只要看到我的文章，他们就会传看，还会对新来的工人讲，这个作者过去就是咱们车间的。

写完《师傅》，我的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岁月，不仅是用来追忆的，也是用来书写的。

作者笔下交织成一幅立体的晚清社会图景。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刻画相结合，不仅让吉果的形象更加丰满，也让读者得以透过这个小人物的命运，窥见那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

删天在故事结尾为吉果安排了一个不知所终的结局，这仿佛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留肝胆两昆仑”遥相呼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气质在吉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吉果的时代，有无数有良知的人和他一样，默默坚守信念，以不同方式推动历史前行。吉果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在于他身上展现出的民众在历史洪流中的坚韧与担当。通过对吉果的精心塑造，删天为我们还原了一段鲜活的地方历史，更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是无数小人物用生命和热血书写的壮丽史诗。每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个体，都值得被铭记。

核，不仅体现了作者对读者心理的精准把握，更展现出一种宝贵的学术自觉。张艳丽坦言，本书旨在推进在校大学生的经典阅读，所以辑一以讲稿的形式探讨鲁迅、许地山、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不同的生命品格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由人及文”的论述路径，显示出作者将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相结合的学术理念。辑二则重在单篇作品的研读，呈现出从“面”到“点”的聚焦，对《雷雨》《金粉世家》等经典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辑三不仅对社会言情小说这类作品的生命意识与传播路径进行研究，而且涉及通俗小说影视剧改编及当代电影。尤其以张恨水小说的电影改编为例，对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论证。简言之，以“生命意识”切入文学经典的传播研究，是作者在当前媒介传播格局巨变的时代语境下对文学热点问题的回应。

总体而言，该书以“生命意识”为内聚核，将文本阐释与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典作品的多维角度，更体现出作者所具备的“大文学观”。这种综合文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专业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值得肯定。

(作者系应急管理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

口述史作为打捞历史微观记忆、补全宏观叙事的重要方法，让沉默的个体经验成为历史书写的鲜活注脚。上海三联书店新出版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马林英的专著《百岁人生中国史：从西南民族考察到荣获“友谊勋章”的伊莎白口述记录》，以伊莎白·柯鲁克的百岁人生为线索，将个体的生命轨迹与百年中国的社会变迁、民族发展、中外交流深度结合，在史料挖掘、学术范式、叙事表达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为口述史研究贡献了新成果。

就史料价值而言，该书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近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与边政学实践的文献空白。伊莎白自1939年起深入西南腹地开展民族考察，以局外人视角，捕捉到乡土社会与民族地区的真实细节，从民间习俗、生产生活，到民族交往、社会变迁，皆有详细观察和记录，成为补全近代西南民族史的珍贵素材。同时，其口述中关于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状况、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华活动的记录，也丰富了中国革命史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史料，让宏观历史有了可触摸的微观支撑。

在学术范式上，该书为口述史研究的跨学科融合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作者马林英秉持“抢救性记录”原则，历时十多年进行访谈、整理与考证，既尊重口述者的生命记忆，又通过档案文献、田野调查进行交叉验证，有效规避记忆偏差，彰显出口述史研究的严谨性。该书以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基础，将口述叙事与民族学、历史学、边政学等多学科理论结合，打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壁垒，实现跨学科会通，让个体生命史的解读获得更丰富的学术视角。尤为重要的是，该书首次系统整理并公开了伊莎白未及成文的调查资料，令这些尘封的学术遗产重见天日，既弥补了伊莎白西南民族考察的学术遗憾，也为后续的史料整理与转化建立了规范。

叙事表达的创新是本书的又一价值。《百岁人生中国史》以个体生命史勾连宏观历史，拓宽了百年中国史的叙事边界。不同于宏观叙事，该书以伊莎白的百岁人生为主线，将西南民族考察、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历史维度串联起来，让个人命运成为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从深入西南民族地区调查，到参与中国的教育事业与社会建设，伊莎白的每一段经历都与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紧密相连：她见证了西南民族地区从封闭落后到开放繁荣的历史进程，亲历了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亲身参与了中外文化交流。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让百年中国史融入充满温度的生命体验，使读者能从个体视角更真切地理解中国的发展脉络与多元图景，实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互补与融合。

## “春芽儿童文学周”上海启幕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春芽儿童文学周”在上海杨浦滨江启幕。全国各地百余位儿童文学作家、专家学者、出版社负责人，以及媒体和师生代表齐聚现场，探讨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本次活动由全国少工委、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下称“中少总社”)与中国作协新时代儿童文学出版联盟、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等共同主办。

启动仪式现场，多项合作同步落地——中少总社与杨浦区正式达成合作，共建“春芽儿童文学周”阅读空间及书香校园；抖音、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代表与作家、出版机构代表携手，共同开启新业态跨界合作。聚焦创



“春芽儿童文学周”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 个体生命映照百年中国

——评《百岁人生中国史》  
冯 利



命体验，使读者能从个体视角更真切地理解中国的发展脉络与多元图景，实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的互补与融合。

该书还兼具方法示范与价值延伸的双重意义。其所秉持的长期主义研究精神，以及“口述+文献+影像”三位一体的立体史料建构方式，为同类口述史研究提供了伦理与操作范本，展现了口述历史成为信史的可能性。当个体记忆之“经”与史料佐证、学术规范之“纬”交织融合，口述便超越“空口无凭”的传闻，转而成为还原历史细节、补充宏观叙事的依据，对后续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 历史风云中的璀璨星辰

——评删天长篇小说《海州吉果》

蔡晓妮

百姓的心声，也是百姓心中智慧智慧的化身，这也是他的故事能够流传至今的原因。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它燃起的火种却深植在有良知的人心中，吉果就是其中之一。戊戌六君子在法场被杀时，吉果为他们高歌送行，因而获罪，从一个有美好前途的少年神童转变为朝廷通缉犯。在别人避之不及的时刻，他罔顾个人安危而站在正义一边。回到故乡海州，在和贪官金盖天、金耀祖斗争的过程中，他足智多谋，表现出胆略和勇气。而面对弱者和普通百姓，他总是施以援手，助其渡过难关。海州所辖赣榆、沭阳两县

遭遇水患，先淹后旱，哀鸿遍野，吉果挺身而出，带领乡亲们整河修湖，加固堤坝，攻坚克难。在十六王爷勾结洋人出卖海州矿山时，他机智地周旋。和慨然赴死的戊戌六君子一样，吉果以生命捍卫理想，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作者对海州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使书中的细节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作者并不局限于写海州，而是将海州放在中国的风云变幻中书写，通过吉果这样一位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串联起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社会变革与思想激荡。京城朝堂的瞬息万变，海州乡间的民生百态，在

## 以“生命意识”统摄作家作品研究

——评张艳丽《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

刘晓岚

价值提供了启发。

以“生命意识”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学术眼光。作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凸显出人们更加需要“以文学为路径，发现及探寻个体内心深处之本相与渴望，获得心灵的满足”。然而，目前从“生命意识”切入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文学批评中自觉运用相关理论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生命意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被充分讨论，作者在新著中进行了积极探索。

张艳丽根据其对于生物学、社会学及心理学有关“生命”问题的研究，结合学界前驱观点，提出“生命意识”概念及其三个层面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阐发经典作家作品被忽略的价值。比如，她将鲁迅对人性本相的揭示与英国的C.S.路易斯、法国的萨特等人关于人性的观点进行比较，指出其在世界文学中的超前性与预见

性。再如，她看到了沈从文与鲁迅在思想层面的相通之处，发现沈从文看似以艺术家的直觉描画湘西，实则以其思想家的理性探寻生命本相，就此而言，沈从文与鲁迅“立人”的思想殊途同归，而强烈的生命体验与敏锐的生命意识正是两位作家思想相通的根本。此外，她指出，《雷雨》的创作由作家的生命本能驱动，并分析了剧本在身体、心理及灵魂三个层面对生命意识独特而鲜活的表达，尤其对繁漪、周冲这两个人物形象提出了独到看法：“这两个人物，一暗一明，一个代表现实，一个代表梦想；一个充盈着肉体与情感生命意识受压的郁热，一个抒发着灵魂生命意识的圣洁与高昂。”张艳丽以“生命意识”为认知装置透视文学经典，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洞察力追根溯源，真挚的情感、清晰的思路使本书产生了理性与感性并存的艺术张力。

独特的文体编排与选材策略充分彰显出该书“生命意识”的精神内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与写作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热门。人工智能写作与人类写作的边界在哪里？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什么？当学界围绕人工智能对传统文学创作的冲击展开热烈讨论时，青年学者张艳丽另辟蹊径，以“生命意识”为我们提供了观照文学创作本质的新视角。她的学术专著《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研读，不久前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大胆的创新意识，挖掘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内涵及传播路径，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重估文学